

【文学艺术】

批判与超越

——论钱钟书独立的文化意识

赵红

(西安财经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钱钟书以偏锋的姿态对于时代的批判和文化的反思构成了 20 世纪文化史上一道风景。他的独特的学术研究、独到的思想见解和独立的人格精神,证明了一个有良知、有真知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中特殊的价值。

关键词: 钱钟书;文化意识;独立性

中图分类号: J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2)02-0060-04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 On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of Culture in Qian Zhong-shu's Works

ZHAO Hong

(Xi'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f culture in Qian Zhong-shu's works standing for minority trend comprise one aspect of the history of culture in 1900s. His distinctive academic research, original thoughts and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prove the special of conscientious intellectuals with real knowledge in that age.

Key words Qian Zhong-shu; consciousness of culture; independency

如果要写 20 世纪的文化史,钱钟书绝非能轻易回避。尽管自 1996 年以来不断有人对钱钟书的学术价值和人格价值提出质疑,甚至是十分尖刻的批评,但我们若能真正撇开偏激与浮躁,历史地、全面地去看钱钟书的为文为人,就会为他在各种背景与时局中始终如一的独特姿态和从容态度而惊讶。在启蒙与救亡的文化主旋律中,相对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钱钟书或许算不上主流作家,但他喜欢站在社会生活的边缘对时代和社会作冷静思考。这样的选择也许与个性有关,也许是出于无奈,总之,偏锋有时并不让主流,他对历史和社会的发言反而更透辟、更具深长意味。不论他的学术著作,还是散文小说,都蕴含着独立的学术价值、思想价值和人格价值。他是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对人类文化进行了冷峻、自觉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他所处时代的一

次大的超越

一、独特的学术研究

20 世纪末是总结这个世纪学术和思想的一个恰当时机。1998 年末学术界就开始寻找这个世纪的大师。有些人很是意气地横扫一片,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也包括钱钟书。他们认为钱只能代表学问的高度,认为他的学术研究方面没有体系也没有思想^[1]。后来又有人发表《沉默即死亡》,干脆把钱的学术研究等同于“注释”,“为一桌鸡毛蒜皮也要找来五湖四海的洋佐料。《管锥编》压根就是卖弄,为读者设置人为障碍,犄角旮旯地掉书袋子”。“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一篇可以给人警醒的东西”。我们或许可以不重视当代学人如李洪岩、陆文虎、胡河清、陈子谦、敏泽等对钱钟书学术著作的发掘,也可

收稿日期: 2002-03-11

基金项目: 陕西经贸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JM Y00-10)

作者简介: 赵红 (1967-),女,陕西西安人,西安财经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以不了解胡适、张申府、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等对钱曾有过的高度评价,但要评价钱钟书,不能缺乏历史的全面与客观,也不能缺乏哲学的深刻与冷静。

钱钟书虽自称“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但根据他学术研究的成就,很难将他定位为古典文学研究者。他的三部重要的学术论著《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看似借研究古典文学进行文艺批评,而实质上是借此为立足点进行社会文化批判和哲学思辨。他所运用的独特的治学方法及所表现的深刻的思想内涵显然已超出了传统的“乾嘉之学”的学术模式。钱钟书的学术研究首先根基于丰厚的学养。他的学术论著无异于一座丰富的知识宝库,那些妙义纷呈的诠释、评论、析疑、辨伪、驳讹、引证、溯源、发挥、比较……都充分显示了他的渊博而扎实的学问功底。孰不知这背后隐藏着的独特的方法更显示了他深刻而精微的思辨才能。

钱学研究者李洪岩曾将钱钟书的治学方法概括为“以管窥天”四个字。事实上任何学术研究本身都是有局限性的,“以管窥天”未必就没有科学性。而这种治学方法却屡屡被人批评为没有体系,在多数人的思维定势中“体系”代表着理论的高度和思维的严密。不过钱先生却一眼洞穿了“体系”的虚弱,他之所以避开庞大吓人的“体系”而采用随笔体,主要是因为陈言加空话组成的体系太易塌陷,体系越大,漏洞也越大,运用于学术研究往往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不易表现微妙的感悟和直观形象的思维。况且真理或真知并不一定能被“体系”所包涵和代表,有时它就在看似散杂的材料中,就在一段感悟性的评判中,甚至就在一个精彩的比喻中^[2]。

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曾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在他看来“成了专家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显然他是站在人类共同文化心理的高度上,意欲打通中外,融汇古今。他对人类文化的整体把握和历史观照完全源于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打破既定程式,还学术以本来面目,将学术研究引入一种化境。因此,说钱钟书的学术研究绝非支离破碎的“注经”和机械死板的考证。他似乎不大刻意研究论题,但寥寥数语却正是问题的关键。他重视材料的考证而非实证主义,反对空洞的理论体系而不反对理论分析,其实他对材料的选用本身就包含了创造性思维和严密的逻辑推导,那些生动的比喻也折射着哲学沉思和理性之光。

钱先生治学常从具体细微的问题入手,而总是旁鹜八极、纵横挥洒,他不拘成规也不立宗派,往往

在文学研究中透出知人论世、洞达世情的睿智。比如对人性中“恩德易忘,怨毒难消”的论述,对人们常感困惑的如何既坚持原则性又具灵活性的辨析,对儒家自相矛盾的论题——杀掉暴君是弑君还是革命的阐释都显示出钱钟书对一个学问家的超越^[3]。

有趣的是就连那位批评钱钟书的学问形态“忽略了更为艰难的论证”的学者,也承认《谈艺录》《管锥编》内容精炼、充满智慧与启示,“任拈一段都能敷衍成长篇大论”。的确,钱钟书的学术研究是博大精深的,他吸收了中国传统治学重悟性、重考证的特点,又兼取西方近代哲学重理性分析和现代哲学重人文精神之长,因而比起他的前辈和同辈,他的学术研究多了现代意识和整体把握。从内容上看,他打破壁垒,采撷百家,熔古今中外于一炉;从方法上看,他从材料入手,找准基点透视宏观,自创立体式、开放式的学术研究模式。可以断言,他的学术境界乃是由深厚学养和社会人生体验所熔铸而成的超越之境。

二 独到的思想见解

客观地说,钱钟书的思想并不具备完整的逻辑体系,因而难以成为开宗立派之学,但决不能因此忽略他的思想价值。他的思想方法和内容不长于建构,而在于解构,像一切偏锋一样,钱钟书善于侧面入手,讽刺与批判也就成了他表达思想的独特姿态。

作为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钱钟书显然脱去了激越和浮躁,大学时代就精辟地指出“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4]。他的冷静似乎与年龄不能相称。此后在他的学术和创作生涯中也很少发表正面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消极逃避,客观上他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关起门来做学问。他的学术论著中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对封建文化腐朽性的揭露无不关涉现实人生,只不过他对社会对时代的发言更多地侧向文化层面。

五四狂飙突进式的文化革命注定是不彻底的,它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生吞活剥,造成文化的严重错位。钱钟书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对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和重新整合,本身就具一种超越同时代的思想境界。

如果说他的学术著作看似赏析谈艺之作,实则透出深广的忧愤,那么他的文学创作则看似写婚恋家庭却透出更为锐利的批判锋芒。长篇小说《围城》的思想意义就在于对现实社会的讽刺和批判。方鸿渐就是一个“否定的精灵”,在他眼中一切都是那么虚妄、虚弱,一切都是那么不堪一击。钱钟书借鉴西

班牙流浪汉小说结构模式,通过主人公的足迹所至展示丰富的社会生活画卷,进而批判了西欧资本主义文化中浓厚的商业气息;批判了上海小市民文化的鄙薄和庸俗;批判了封建文化对人的深重压抑;批判了教育制度的不合理及知识分子的虚伪、偏狭和懦弱。方鸿渐一事无成,甚至连份平常的婚姻也不能保全,他的苦闷不限于找不到真爱,关键是找不到灵魂的归宿。短篇小说《猫》揭示了华丽人生的虚假,批判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精英的无聊空谈。《灵感》则明显表达了对当时某些作家(夏志清认为可能影射鲁迅或蒋光慈、曹禺等)和文艺创作水平的不满^[5]。《纪念》写人的理想的虚妄,其中所表达的对人性的认识、对生存的关注透出几分悲剧意味。《上帝的梦》讽刺了自我膨胀的权力狂,否定了绝对权威的存在,揭示了社会人生的深刻哲理。

而他散文的批判精神和思辨色彩更近乎杂文。他站在人生边上却更冷静、更智慧地悟得了人生的真谛。《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直接针砭时弊,不仅讽刺了“粗制滥造”的多产作家,“鬼话连篇”的多情诗人,甚至直指人间即是地狱。这里的魔鬼显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恶魔,而是否定和批判力量的代表。这个被但丁称赞为“善于思辩”和被歌德称赞为“见多识广”的魔鬼,对于社会历史的分析是极为中肯的,他指出了人的灵魂已被物欲全部蚀空,深刻的批判中掺着心底里的悲凉^[6]。

相对于鲁迅对国民心理的剖析和老舍对北京人的刻画,钱钟书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是较为独到的。作为这个阶层的一员,他太了解这个阶层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乏聪明善良,甚至也不乏真诚,但他们太缺乏坚持正义和追求真理的勇气。所以,钱钟书笔下的知识分子既非执著理想的英雄,亦非不断奋斗的巨人,这正是钱钟书对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总结与概括。他不仅批评左翼作家思想和艺术的幼稚,讽刺唯美主义者不问时政的懦弱,更鄙视那些“天天发表言论,教训人类”的假道学。

钱钟书对知识分子弱点的表现还源于他对人类文化精神的宏通把握,他对“经典学说”的批判是认真而严肃的。首先,他大胆揭示儒家思想所具有的矛盾,如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历来被儒家视为义与德之典范,钱却引用东方朔“古之愚夫,不能与世推移,而自苦于首阳”之论讽刺其进退两难的心理。另外对儒家文化强调的君臣、父子、夫妻的等级观,对残害人的灵性的科举制度也多有批判。钱钟书对道家思想的批判更显示出他的机智,他反对道家排斥

理性,一味崇尚神秘直觉,讽刺老子“绝圣弃智”的反文化主义为鸵鸟政策,讽刺道家隐士的种种欺世盗名的手段。他对佛家的批评更是发别人所未发,比如佛门高僧常因老庄为柱下书史、漆园小吏,而不能同释迦太子之贵相比,钱认为高僧也不免势利,佛家也有争正统别异端的可笑之举^[3]。至于他对黑格尔、叔本华等为代表的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的批判更是启人心智。

在钱钟书的叛逆性格中,蕴含着冷峻而自觉的文化批判意识,当然这并非偏激,而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是辩证的否定。正因如此,他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人们文化心理的分析才显示出精辟之见和警醒作用。

三、独立的人格价值

钱钟书始终是个非常独立的人。以他出身清华、留学英法的经历似乎不应如此沉寂,但钱的天赋极高且个性中多少带有狂狷之气,骨子深处的傲气使他喜欢独行独立。另外,钱钟书还是个性情中人,40岁前的作品常露锋芒,但40岁以后,就很少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了。我们相信,如此智慧、清醒的钱钟书内心深处一定有许多独特的看法,但都被无情地压抑了。

我们不能苛责他。《宋诗选注》、《管锥编》的写作环境是非常严峻的。我们知道一个话语系统对人们的思想有着巨大的操纵性,那时候知识分子的思想普遍病态无力,毫无独立地“随大流”,而钱钟书却依然能潜心于学术研究,这种我行我素、迥异于时势的行为充分显示了他的清醒、独立和执著。事实上钱钟书在任何时代背景下都保持着冷静与从容,就像柯灵的《促膝闲话钟书君》所说:“他的存在几乎就是迎接不断的挑战,政治动荡的挑战,宗派成见的挑战,世俗的挑战,乃至荣誉的挑战”。据李慎之的回忆文章说,文革中钱被当作牛鬼蛇神遭到批斗,他“既不退缩,也不惶悚”;被打发去清扫厕所,他不说什么;爱婿受迫害自尽他也不说什么;“有幸”被钦定为“毛选”英译本主持人并参加翻译定稿《毛泽东诗词》,他也从不说什么。他给杨绛的《干校六记》写的小引看似幽默平静,内心是何滋味,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宋诗选注》中有意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据说主要嫌它道学气重。20世纪80~90年代商潮涌动,他依然淡泊名利,哈佛大学高薪聘他讲学,他拒绝了;学术界兴起了“钱学热”,他不满地说:“吹捧多于研究”^[4]。他就是这样从不哗众取宠,对一切毁誉都安

详从容,真正洒脱超然,荣辱不惊。

但是如果就此而推断他是个寂寞学者未免太不妥当。他对时代和社会的认识都凝聚在他的著作中,同时他也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他是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以独立自持为基本立场。在那样疯狂的年代,他只能选择沉默。

文革后许多人谈到自己思想或创作方面的局限,往往归咎于时代的错误,还有难释于怀的愤恨与委屈,可钱钟书后来谈到《宋诗选注》的缺限时,则从个人思想方面寻找原因。他对自己所有的文字都是极为负责的,无论是小说还是学术著作,他总是改增、补订,力求完美。

如果非要给钱钟书归类的话,他应该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多数情况下他和那些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不相同。在我们历史上发生了太多知识分子集体背叛、集体遗忘的悲剧。中国文化确实也鲜有培养叛逆性格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钱钟书以偏锋姿态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独立的人

格价值也因此得以凸现。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盖人文之留世者,最有力者莫如心声”。钱先生留下的那些独立而真诚的文字就是对他的学术价值、思想价值、人格价值最好的注释。

参考文献:

- [1] 葛红兵.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写份悼词 [J].芙蓉, 1999, (6).
- [2] 陆文虎.钱钟书研究采辑(二) [M].北京:三联书店, 1996.
- [3] 舒展,编.钱钟书论学文选 [M].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0, (1).
- [4] 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 [J].文学评论, 1999, (3).
- [5] 辛广伟,李洪岩.钱钟书研究丛书(二)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 [6] 郑朝宗.钱钟书研究(一) [M].北京:文学艺术出版社, 1989.

(上接第 4 页)

以后还能采到叶子。这些都是保护生态平衡的措施,也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于人类则有更多的怜悯之心,实行的是仁爱的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跟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友好相处。和平共处,是我们的愿望。但是,如果有的坏人想欺负我们,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那就要起而反抗。就像抗日战争那样。我们不打日本,日本的军国主义却侵略了中国,我们就应该奋起反抗。到那时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地道战、地雷战,什么形式的游击战都可以采用,因为正义在我们手里。几十年以后,如果我们国家强大了,也不要称

霸,也不要去打其他弱国,强迫它们服从我们。日本有一个儒家天天给学生讲儒学,学生问:“如果孔子挂帅,带领他的弟子来进攻日本,我们怎么办?”老师说:“坚决地狠狠地打他们!”学生问为什么,老师说:“孔子儒家主张仁义,不会去进攻任何国家,会来打日本的,就一定不是孔子及其学生,一定是假的孔子”。不打外国,是我们的传统。不称霸也是我们的传统。因此,我们不会成为周边国家的威胁。如果我们的后代违背这个传统,富了就对别国进行经济制裁,强了就对他人进行军事威胁,那也会遭到外国的报复,自己必然得不到安宁。总之,我们要继承优秀的传统,为世界和平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上接第 27 页)

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城乡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体现新时期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创业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大量涌现。

综上所述,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不懈奋斗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探索建设中国先进

文化的过程。今后中国共产党仍将继续坚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而努力奋斗。这既是中产党的鲜艳的旗帜,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2]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3]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